

石光银：治沙人与毛乌素的“斗智斗勇”

“30 多年间，石光银在承包的国营、集体荒沙碱滩上种活了 5300 多万株（丛）乔灌木林，在毛乌素沙地南缘筑起一条长百余里的“绿色长城”，还通过公司+农户+基地，带动当地群众脱贫

3月6日上午，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陕西代表团全体会议上，69岁的石光银正认真聆听代表们关于“十四五”规划纲要草案的发言。听到有关开展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巩固退耕还林还草内容时，他感到亲切又欣慰——自己多年的努力始终与国家政策“同频共振”。

这位全国人大代表、陕西石光银治沙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十几岁就带领村民在荒漠里开辟了家乡第一片绿洲。他生长的地方是陕西的“西北门户”定边县，位于毛乌素沙地南缘，常年风沙肆虐。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尚未写出《白鹿原》的陈忠实曾在毛乌素沙地行走时，一轮又圆又大的满月成为他美好回忆。而在石光银记忆中，那时候月亮出来，风沙都把月光刮得昏黄，贫瘠的土地没有多少粮食。

1984年，国家出台政策允许农民承包治理“五荒地”，他专心治沙的决定在这一年下定。30多年间，石光银在承包的国营、集体荒沙碱滩上种活了5300多万株（丛）乔灌木林，在毛乌素沙地南缘筑起一条长百余里的“绿色长城”。

2018年，石光银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履职以来，他最关心的还是生态环境。今年



左图：1998年7月，陕西省榆林市定边县帮助入股治沙的群众在沙地里打出多眼多管井。
右图：2020年5月30日，石光银在自己治理的林子里捡到一根野鸡翎。他以联户治沙的方式，带领村民将25万亩沙地变成了绿洲。

他仍针对当地退耕还林存在的实际问题，提出建议。

“退耕还林、公益林的补助要提高。补贴太低，群众考虑眼前利益，积极性不会高，但咱们国家要考虑长远利益、几代人的利益。”他说，在现实中还存在一些粮食产量低、荒漠化严重，但由于实地坡度与资料不一致难以划入退耕还林范围的土地，需要进一步制定解决办法。

石光银之所以能对这些问题侃侃而谈，归根究底，还是因为治沙这一路，他经历了太多。

最初，辞去乡农场场长工作、卖掉家里赖以生存的84只羊和一头骡子的石光银，带着6户村民承包了3000亩荒沙地。“东拼西凑才凑够树苗钱，好在天公作美，当年树苗就活了85%。”石光银感到庆幸，虽开局不易，但收获尚好。

但很快，挫折不期而至。1986年，他决定挑战十年九旱、寸草不生的“狼窝沙”，未曾想在四、五月份就遭遇了十多次六级以上大风，压倒了90%的树苗。第二年，悲剧重演，存活率仅20%。

月色朦胧，前路无解。不少村民退出，但石光银仍有执念——他找林业技术员请教、到外地学习治沙经验，1988年春天用学来的“障蔽治沙法”固定住流沙，八成树苗得以存活。

成功治理“狼窝沙”为石光银打开了治沙窍门，也让他意识到要讲科学、不能蛮干。他在“狼窝沙”盖起小学，希望孩子不再吃不识字的亏。他说：“下代人应该用高科技造林治沙。”

“今年在两会上了除了提改善生态环境方面的建议，我也非常关心乡村振兴。”石光银说，多年前他就想清楚了一个道理——治沙

苏伯民：科学家与莫高窟的“化学反应”

“29 个年头，时光成为苏伯民与莫高窟之间的“催化剂”，“化学反应”在日升月落间悄然发生，壁画在他眼中有了生命的气息，别人看到的是静止的物，他看到的是活的生命和无穷奥秘



左图：2020年11月9日，游客在莫高窟参观。
右图：3月5日，苏伯民代表通过网络视频方式接受采访。

之间的差异。

“敦煌女儿”樊锦诗回忆自己第一次看到莫高窟，那场景令人动容：“看一个窟就说好啊，再看一个还是好啊。说不出到底有多么大的价值，但就是震撼、激动。”

苏伯民描述自己初到敦煌的工作，“画风”是这样的：“实验室条件简陋，每天和和泥、调材料，感觉没啥技术含量。”

显然，文化瑰宝与科学家的“邂逅”，起初并没有发生“化学反应”。落根针都能听见，游客散尽的莫高窟安静得令年轻人发慌。最开心的事儿，是周末的黄昏坐车到城里，点上啤酒、吃几根烤串，看人来人往，感受一下热闹的人间烟火。

“英雄无用武之地”的彷徨，消散在敦煌研究院加深国际合作的时代。

上世纪80年代末，敦煌研究院开始与美国、日本等国家的机构开展合作。尤其是1997年与美国盖蒂保护研究所合作开展的莫高窟第85窟保护研究，成为我国文化遗产领域国际合作的典范。

第85窟营建于晚唐时期。古代工匠的妙笔下，一千多年前耕作、狩猎、嫁娶等生活场景活灵活现。

然而，千年的风沙摧残，让这个美妙绝伦的洞窟几乎患上了所有种类的病害。最严重的是酥碱，一种能让壁画化为粉末的“绝症”。一阵微风，就可能让一块千年壁画消失无踪。“特别心疼，却一点办法也没有。”莫高窟人曾束手无策。

研究发现，病害的“罪魁祸首”是岩体里的盐分。空气湿度变化，让盐分反复潮解、结晶，最终出现各种病害。

历时7年、尝试80余种配方……苏伯民所在的敦煌研究院研究团队和外国专家一步步破解难题，终于找到既能脱盐又能保持壁画原貌的好方法。如今，第85窟的洞窟环境依然稳定。基于此次合作探索出的文物保护流程，还直接推动了行业标准——《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的出台。

合作让苏伯民接触到预防性保护等国际先进理念，也令他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科技在文物保护中大有可为。

科学家的想象力，在文物保护领域展翅飞翔。

2009年，我国首个文物出土现场保护移动实验室成功研发。这个将信息采集、智能探测、分析检测、现场提取等诸多功能单元集成搭载在车辆上的实验室，第一次将系统的科学研究体系“前移”到文物出土现场。

这个可移动的实验室灵感来自何处？担任课题负责人的苏伯民给大家一个意想不到的回答——科幻电影《侏罗纪公园》。

科技在文物保护中大有可为的意识，逐渐变成他的使命。

成为全国人大代表后，苏伯民连续提出设立文物保护基础科学研究方向、将文物保护认定为独立学科、加大对文物数字化技术的创新研究等诸多建议。

全新的时代，给了当代莫高窟人大显身

和致富是统一的。

“治沙并不等于单纯植树造林，治沙、治土、治碱都是为了治穷，群众是要算这个账的。”他说，“如果不治沙，脱贫致富只是一句话，治沙走在前面，粮食产量才能提高，致富才有希望。”

依托当地林草资源，他主要发展畜牧业，尤其是肉牛业。这些年他办起秀美林场、百头肉牛示范牧场、三千吨安全饲料加工厂、林业技术培训中心……

通过公司+农户+基地，带动当地群众脱贫。马铃薯良种繁育基地、松柏园、生态林等的建设使荒沙治理、苗木培育、休闲旅游一体发展，惠及1500多户农户。前年他还给当地捐了45万元，支持村民继续发展设施农业。

这几年，在履职调研中，石光银发现当年栽种的灌木林寿命短、经济价值小、观赏性差，二次沙化可能性很大。他果断开始二次植树造林和低产林改造，并将推广新树种写进建议里。

“以前谁能想到我们这里能长松树啊！”石光银说，“去年我种了7000多亩樟子松，今年打算再种两三千亩。”最开始把流沙治住，粗放型造林，之后再吧高标准树种引进来。石光银认为这个过程“顺理成章”，“要把高科技引进来，把人才引进来”。

石光银的孙子石健阳在大学选择了林业技术专业，毕业后回到定边。现在，他接过爷爷手中的接力棒，带动周边技术人才发展林下经济。

沙地中流动沙丘已难觅踪影，绿油油的植被下，开始形成薄薄的腐殖质。石光银终于能平心静气地欣赏毛乌素的风光——月光清幽，树影婆娑。

“‘十四五’这五年，我们要继续提高精品树种数量和质量，让冬天和夏天都能看到绿色，努力让家乡生态环境再上一个台阶。”石光银说。

（记者黄姝、姜辰蓉）
新华社北京3月6日电

手的契机。

“国家对文化的重视是前所未有的。流淌在中国人血脉中的文化自信越来越强烈，我们也要承担起更重要的时代课题。”苏伯民说。

多次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建立我国文物保护领域首个国家工程技术中心、带着壁画和土遗址保护理念技术走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新一代敦煌儿女对标国际、静心钻研之下，莫高精神续写着新的篇章。

“我们100来人的保护团队，光去年就承担了3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现在的课题都在啃文物保护的‘硬骨头’，致力研究文物劣化的深层机理。”苏伯民说。

时光，成为他与莫高窟之间的“催化剂”，“化学反应”在日升月落间悄然发生。“天天跟莫高窟在一起，人是会有变化的。”回望近30年的敦煌生活，苏伯民感慨万千。

科学家的理性，逐渐渲染上感性的温度。

壁画在他眼中有了生命的气息：“别人看到的是静止的物，我看到的是活的生命和无穷奥秘。壁画中的一抹绿，不仅是有机颜料、无机颜料的叠加，更蕴含着匠心巧思。”

当年能耐的静，也已涤净青春的浮躁。茫茫戈壁，夜凉如水。苏伯民有时会感怀过往——常书鸿、段文杰、樊锦诗……那些曾在同一片星空下守望、奋斗的敦煌儿女，那些纯粹、无悔的青春芳华。

“这山望着那山高将是人生的巨大损失。专心致志把一件事做到极致，是个人的幸运，也能推动国家的发展。”如今的他，也已“择一事，终一生”。

只不过，作为全国人大代表的苏伯民，肩上背负着更多的重任；他的眼中，还有更加宏伟的蓝图。

“我呼吁成立丝绸之路文化遗产保护的国家重点实验室。”苏伯民说，技术仍然是文化遗产保护面临的最大瓶颈。在“一带一路”背景下，丝绸之路文化遗产保护更是重要课题。目前，文物保护领域还没有国家重点实验室，他希望能通过搭建平台，汇集更多优质的团队和科技资源，为我国文化强国建设提供支持。

所有的奋力奔跑，都为圆一个时代的梦想：“让文化自信在每个中国人心中闪光。”

（记者施雨岑、张玉洁）
新华社北京3月5日电

57岁的周义哲大半辈子都在跟树打交道。

当了35年伐木工后，他响应国家政策成为护林员。2018年，他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继续致力于保护森林资源。

“从‘砍树人’到‘看树人’，你这个身份转变，正是我们国家产业结构转变的一个缩影。”5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在周义哲所在的内蒙古代表团参加审议时对他。

周义哲是内蒙古森工集团满归林业局有限公司北岸林场第七小队工队长。

他从小在林区长大，16岁时成为伐木工。当时，他所在工队50多人每年冬天生产的木材能装400节火车皮。

随着中国发展理念的变化，1998年，天然林保护工程启动，大兴安岭林区木材逐年减产。中共十八大提出建设“美丽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2015年，内蒙古大兴安岭林区全面停止天然林商业采伐。

“我当时想，不要我们砍树，我们干啥、吃啥、喝啥，老婆孩子怎么办呢？”周义哲说。

后来，他发现停伐后不但有活干，还有钱赚。

“林子还是这片林子，干的活不一样了。过去，我们用锯和斧子砍树。现在，我们用锯和镐种树。”周义哲说，以往只能挣半年工资，现在一年到头都有收入，年均收入达6万多元。

内蒙古大兴安岭1.6万林业工人从“砍树人”转变为“看树人”。周义哲作为工队长之一，指导和管理工作，管护森林、防火、综合抚育、病虫害防疫等工作。

与工友们在林区巡护时，周义哲经常坐2小时通勤车到管护区域，再步行五六小时巡护山林，然后乘车返回。

“手机上每天记录的步数经常超过2万步，都是在林区走出来的。”周义哲说，他既要跟工友们检查火灾隐患，还要制止乱捕乱猎、乱砍滥伐、乱挖乱采等行为，并关注森林病虫害。

全面停伐后，森林得到休养生息，生态环境明显好转。第九次全国森林资源清查结果显示，1998年至2018年20年间，内蒙古大兴安岭林区森林面积净增99.45万公顷，森林覆盖率提高了9.25个百分点。

有一年，一位来自北京的客人走错路，到管护站问路，周义哲告诉他多走了90公里。那人却说：“我可没白走啊，等于逛了一趟野生动物园，值了！”原来，那位游客看到青山绿水，还遇到野生动物。这让周义哲加深了对“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解。

成为全国人大代表后，周义哲把主要精力放在调研如何促进林区发展上。“首要的是加强森林防火工作，守护好绿色屏障，另一个是改善林区通信条件。”他说。

大兴安岭雷击火多有发生，周义哲亲眼见过百年树龄的樟子松林毁于火灾。

“那种心疼，就像农民看到庄稼瞬间毁于一旦。”他说，有的雷击火未能及时扑灭，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林区防火应急道路不通畅。

他今年在全国两会上建议，加大对林区防火道路的建设，“一旦发生火灾，多修一公里防火公路，就能多保护一片原始森林”。

近些年，国家惠民政策越来越多，内蒙古大兴安岭林区职工生产生活条件也越来越好。不少人搬进新房，林区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移交地方政府，企业负担减轻了，职工工资连年增长，日子更加富裕。

但对妻子、女儿和外孙，周义哲常感愧疚。女儿一家住在外地，妻子经常帮忙照顾外孙，而周义哲长期在林区工作。

现在，周义哲最大的愿望就是有更多年轻人到林区发展，为林区建设贡献力量，他才能放心退休，与家人团聚。

2020年底，内蒙古森工集团公布招录高校毕业生计划后，报名人数超过3000人。“看到年轻人热心接过接力棒，守护这片绿色林海，心里特别高兴。”周义哲说。

（记者于嘉、吕秋平、赵泽辉、熊争艳、朱文哲）
新华社呼和浩特3月6日电



图为周义哲查看森林抚育情况。（资料图片，图片由内蒙古森工集团提供）